

历代散文丛谈

郭预衡 著



责任编辑 宋金龙

历代散文丛谈

郭预衡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34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册

*

书号: 10088·983 定价: 3.05元

序 言

中国历史悠久，散文遗产丰富。书名《历代散文丛谈》，其实谈的并不全面。有些地方还没有谈到，未免名不副实。虽然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名实相副者本来不多，一个书名，也许不算什么，但我还是愿意作些补充，概括谈谈历代散文的主要特点，作为本书的序言。

这里且从殷商谈起。

殷商时期的散文，就《尚书》里的“商书”来说，可靠的只有《盘庚》三篇。这三篇文章虽然不无后来增益的成分，但基本上保存了原来的面貌，具有当时文章的特点。这特点是什么呢？曾经有人认为，其中用了很多比喻：“若颠木之有由蘖”，“予若观火”，“若网在纲”，“若农夫服田力穡”，“若火之燎于原”，“若射之有志”，如此等等，很富于形象。但富于形象，乃是先秦散文共同的特征，殷商之文还有没有自己的特点呢？一经比较，我以为殷商散文，以《盘庚》而论，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特点就在于：“恪谨天命”，“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从这些话看，特点就是靠天发令，简单命令。这一特点是和殷商的政治状况有关的。当时正当奴隶

主专政的盛世，有恃无恐，发号施令，比较简单。

到了周朝，文章的特点有了变化。拿《尚书》的几篇“周书”来说，就不仅是靠天发令了。周公告诫成王的话，都是谆谆教诲，以《无逸》而论，其中虽然也讲天命，却更多地讲到了人事，讲“保民”多于“敬天”，特别是常讲以殷为鉴，讲君子要“先知稼穡之艰难”，如果“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那就有亡国的危险。西周的几篇诰命之文，主要特点就是善于说教，用历史经验说教。这一特点也同西周的政治状况有关。西周虽然也是盛世，却已看到庶民可畏，因此，诰命之文，谦恭戒惧，不似殷商那样简单。

到了春秋之世，文章的特征又有变化。这时王纲解纽，政在诸侯，诸侯相争，不仅靠打仗，还要靠外交。于是大夫行人，尤重辞命。《左传》一书就是记录了大量的外交辞令的。其中最突出的是郑国子产的辞令。当时郑国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子产身为执政大臣，左右应付，相当困难。但也正是在这困难的条件下，他出色地进行了外交活动。虽然不能以武力克敌，却往往以口舌制胜。“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子产有辞，诸侯赖之”。他的辞令曾经得到当代权威人物孔子等人的称赞。正是这样的辞令，成了《左传》文章的重要特征。当然，这时善于辞令的不止子产，也不止郑人。但郑人善于辞令，最为突出。还有一个邓析，也是郑人。此人能“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辩”。《吕氏春秋·离谓》有这样一段记载：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

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是说，卖尸者索价甚高，买尸者向邓析请教。邓析说：“没事，你不买，他卖不出去。”卖尸者也向邓析请教，邓析又说：“没事，他不买，别处也买不到。”这大概就是“两可之说”，“无穷之辞”。但可惜的是，邓析的著作已经失传，否则，他的辞令一定相当可观。

到了战国，文章的特点变化更大。百家争鸣，驰说云涌。

“家挟飞钳之术，人持弄丸之辩”，诸子百家，无不长于辩论。孟子是号称“好辩”的，他自己也不否认。至于纵横家苏秦张仪陈轸公孙衍之流，其逞辞善辩，更不待言。由于争鸣和论辩，语言的表达能力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例如《庄子·齐物论》中有这样一段：

啜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恶乎知之！”

曰：“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

“然则物无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

象这样的文章，在运用语言的艺术方面真可以说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有人说庄子之文是诡辩，我以为不然。正是这样的文章最能体现战国之文长于论辩的突出的特点。

战国之后，是秦的一统天下，但“秦世不文”，这里可以不论。

到了汉代，文章的特点又不同了。汉朝的一统天下，长达数百年之久，其间文章不无变化，想用只言片语概括其特点，

当然有些困难。但我仍然觉得，其主要特点也有两个。一是歌颂，一是牢骚。歌颂包括讽谏，牢骚包括诽谤。古来有句联语说：“西汉文章两司马”。我以为，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正是代表了汉文特点的两个方面。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固然是歌颂，《封禅文》更是歌颂。至于有所讽谏，那是曲终奏雅。司马迁的文章，不仅《报任安书》是牢骚，全部《史记》都充满着牢骚。前人说是“谤书”，没有说错。当然，《史记》也称“实录”，但要知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录”就是“谤书”，说实话就是诽谤。汉代文章产生这样两个特点是有历史原因的，尤其是在汉初，当战国纷争、秦政烦苛、楚汉相持之后，大乱之余，人心思治。作者秉笔为文，态度都很积极。歌颂固是效忠皇朝，牢骚也并非忘怀世事。真正消极遗世者，没有牢骚。

到了魏晋，文章特点又自不同。汉魏之际，魏晋之际，晋宋之际，“通脱”、“清峻”，“师心”、“使气”、“和平”、“平淡”，表现了不同的政治态度，显示了不同的艺术特征。最能代表此期文章特点的作者嵇康、阮籍和陶渊明。阮籍写过一篇《大人先生传》，有人说其体出自汉人的“设问”，其实不然。文中有这样的话：“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无贵而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嵇康有一篇《太师箴》，应该是讲一些太师的供职之道的，但其中也说了这样的话：“刑本怨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阮、嵇二人的这类文章都可以通向鲍敬言的“无君论”。当然，陶渊明的文章是写得平和的。《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都可谓平淡得很。但是，仔细推敲，则“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此等等，也就近于“无君”了。

到南北朝，文章更崇骈俪，从形式看，当然也是特点。但从实质来说，骈俪只是形式，特征不尽在此。所谓“六朝文”者，突出的特点，在我看来，恐是文人之“无特操”，行文之“无拘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我这里且不举江鲍徐庾，而偏举一个张融。张融曾说自己的文章“不阡不陌，非涂非路”，“无师无友，不文不句”，可是“颇有孤神独逸”。这样的文章究竟如何呢？他有一篇《遗令》，可以为例。其文云：

吾平生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哀事毕，各遣还家。

这样的文章，正如其人，“不可无一”，亦“不可有二”。虽然不能代表六朝一切文章的特点，但从“无特操”、“无拘忌”看，则相当典型。

六朝以后，文章要推唐宋。唐宋所作，号称“古文”。这时的古文家大抵都是因好古人之道而为古人之文的。所谓“文以载道”，当然可算新的特点。但在我看，唐宋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是“载道”，而是好发议论。这是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些关系的。唐太宗的政策比较开放，宋太祖更加优待文臣。台谏可以风闻言事，文人可以制策得官，而很少（不是没有）以口舌得罪。因此，许多作者都遇事敢言，形成文字，也就长于议论了。有的作者，不仅长于议论，而且敢发狂言。在唐宋两代，出过几个狂士。首先一个是元结。元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行者，此人“性不谐俗”，“迹涉诡激”。自称“浪士”，又称“聾叟”，或称“漫郎”。颇近古之狂生。所为文章，狂而且迂。其《处规》、《出规》、《恶圆》、《恶曲》，都是

迂得可以的。后起的古文大家韩愈，也是遇事敢言，发为文章，不免狂妄。其《论佛骨表》，就是相当狂妄的文章。到了宋代，以狂见称的有柳开。作《补亡先生传》，自命为圣人。叶适就说他有“落篱未涉之狂气”。柳开之外，王禹偁、尹师鲁，都以议论见称。至于一代大家欧阳修，其“果敢之气，刚正之节”，也都是“见于议论”的。还有，宋人之好议论，不仅在于论说之文，有时游记之文，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也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时风气，有人说是缺点，我则看作特点。

金、元之文，大抵师承两宋，有成就却没有多少特征。

明人之文，出现特征，也在晚期。在早些时候，无论是前七子、后七子，唐顺之，归有光，也无论是法秦汉，学欧曾，都还不算自己的特点。七子、归、唐，非无成就，但不幸的是，他们尽管要载古人之道，写古人之文，而古人之道已被唐宋作者载完，古人之文也被唐宋作者写完，他们已经无道可载、无话可说了。

正当无道可载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性灵”。于是“独抒性灵”，成了一代风气。此风一开，也就有了特点。所谓明人“小品”者，尽管有些只是“小摆设”，却也是前世少有的。

到了清代，文章的特点，不大好谈。接二连三的文字狱，要写文章，不但无道可载，连明人那一点性灵也没有了。这时期有些文人学者，不作“代圣贤立言”的“八股”，便做名物训诂的学问，讲“汉学”，讲“宋学”，做考证，虽写文章，也都不能算是自己的特点。这时可以勉强算作一代特点的，恐怕还是桐城派的文章。桐城派作文章是讲究“义法”的，按照“义法”写出来的文章究竟应该什么模样，我不很清楚；我只

看到，他们的功力很深，文章写得十分工整，没有什么毛病。方苞的《狱中杂记》，大概可算典型。人们知道，方苞是受“南山案”的牵连入狱的，“身非木石”，未必好受。如果是司马迁，不知要发泄多少愤激和不平。但在桐城义法的指引下，方苞的文章竟写得如此矜慎，好象他只是一个旁观者，连一句牢骚都没有。这一点实在难能。

在清代，这样的文章大概是最合时宜的了，炉火纯青，这当然也应算是一代文章之特征。

但是，文章作到这个地步，有如蜡制美人，也就没有多少生气了。于是物极而反，到了近代，文章便发生了更大的变革。最先发生的，是梁启超的“新文体”。其特点是“纵笔所至不检束”，是“笔锋常带情感”，一反桐城义法。这样的文章，在当时的影响曾是不小的。不过，梁启超也是一个先行者，先行者常不免于简单片面，再说，此公思想又曾一度逆转，从维新转向保皇，一开倒车，这样的文章也就写不下去了。

但文章的变革是一发而不可收的，划时代的变革，是“五四”的散文和文风。这方面我谈过不少，此处不再多谈。

1985年5月1日

目 录

序言..... (1)

东鲁春风 南华秋水

——《论语》、《庄子》之文..... (1)

史家之笔 策士之辞

——《左传》、《战国策》之文..... (10)

《左传》的思想和文章..... (19)

战国文章的两大特征..... (35)

秦汉文章之变迁..... (57)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行文的特征..... (80)

班固的思想和文风..... (87)

汉赋的发展、变化和特征..... (108)

六朝文说·总叙..... (121)

八代文风和曹操..... (140)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146)

六朝文三题..... (151)

北朝文三题·····	(188)
------------	---------

杰出的散文家韩愈·····	(210)
---------------	---------

“谀墓之文”和“以文为戏”

——韩文异义·····	(230)
-------------	---------

从元结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	(236)
-------------------	---------

北宋文章的两个特征·····	(243)
----------------	---------

欧阳修的文风、学风和书风·····	(268)
-------------------	---------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

——读欧阳修散文随笔之一·····	(274)
-------------------	---------

读欧阳修的《论尹师鲁墓志》·····	(284)
--------------------	---------

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	(294)
------------------	---------

行云流水 姿态横生

——读苏轼散文随笔之一·····	(306)
------------------	---------

苏轼《教战守策》的论说艺术·····	(313)
--------------------	---------

曾巩为人和为文的特征·····	(320)
-----------------	---------

金元散文简论·····	(327)
-------------	---------

“前七子”的复古与“何景明”的文风·····	(362)
------------------------	---------

归有光文章别解·····	(369)
--------------	---------

从王阳明到袁中郎

——明代散文发展的一种趋势·····	(377)
--------------------	---------

桐城派的理论和实践·····	(392)
----------------	---------

“五四”散文与文风·····	(411)
----------------	---------

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426)
----------------	---------

千古文章重“白描”	(433)
汉语文章传统的语言特征和风格特征	(437)
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	(454)
后记	(475)

东鲁春风 南华秋水

——《论语》、《庄子》之文

先秦诸子之文，在当时成就最高、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东鲁春风‘吾与点’，南华秋水‘我知鱼’”，讲的就是《论语》和《庄子》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章学诚所说的：“深于比兴”，“深于取象”。（《文史通义·易教下》）也就是善于运用比喻，能够引物连类，阐明道理；即使是讲抽象的理论，也都富于形象。不但“未尝离事而言理”，（《易教上》）而且很少离开形象而说理。理论富于形象性，本是先秦散文的一个共同的艺术特征，而《论语》和《庄子》又有突出的特点。

《论语》是先秦儒家的主要著作。书中主要是记载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论，据说是孔子死后，“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汉书·艺文志》）的；代表着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

孔子是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中一个最有影响的改良派。在政治上，有人说他是复辟奴隶制的，但当孔子在世的时候，奴隶制还没有真正瓦解，因此，与其说是“复辟”，还不如说是“改良”。因为，从他所表述的政治理想看，他不是简单地恢复商周的旧制度，而是要有所“因革”、有所“损益”的。他

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用“仁”来缓和阶级矛盾，用“仁政”来挽救奴隶社会的灭亡。这种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

从思想实质说，《论语》一书、特别是其中一些论政的文字，是没有多少进步意义的；但孔子不仅是个政治上的改良派，他又是个多才多艺、很重视辞令、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人，因此，《论语》一书，在表达思想的艺术上就很有特点，非常富于文采。有的语言极为凝练，富于形象，且含有哲理。例如《子罕篇》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很有特征的语言。虽有大量的说教，但不是板着面孔说教。有的篇章很带感情色彩。例如《季氏篇》讲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和季路去见孔子，说：“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一听便道：“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说：“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于是孔子更发怒道：“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再往下，孔子更为激动，文章的感情色彩更为强烈。此外，有的篇章还能够把抽象的道理寓于具体的故事之中。不仅形象鲜明，而且情节生动。其中最完整的例子是《先进》篇里的“侍坐”一章。

这一章写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孔子首先发问，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是让四个学生各言其志。

子路比较直爽，马上对答：“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

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孔子听罢，微微笑了。然后又问冉有和公西华。两人回答，孔子没有表态。最后，问到曾晰，文章是这样写的：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东鲁春风吾与点”，指的就是这段文字。在这里孔子赞许了曾晰（点）的话，但孔子赞许的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曾晰说的几句话，全是“取象”，并未说理，其含义和子路等所说有何不同呢？对此，历来的学者曾有不少分歧的解释，这里不必多说。我认为曾晰的这番话是用一幅太平无事的景象来表达一种生活理想，从而暗示了他的志向。孔子在战乱的年代中所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太平的社会生活，因此，一听曾晰的话，便立刻表示赞同。

当然，这样的社会生活不是可以坐而等待的。其实现还要靠政治活动。因此，孔子赞成曾晰的志向，却也并不否定子路等人的志向。当曾晰问“夫三子者之言何如”时，孔子的回答是：“亦各言其志也已矣。”那么，为什么笑子路呢？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很清楚，孔子并非笑子

路讲“为国”，而只是笑他“不让”。因此，当曾晰弄不明白而又再三提问时，孔子便又反复作了解释。

这段文章近来也曾有人认为是表达了孔子晚年消极避世的思想，我看不是。孔子的政治态度始终积极，这是他为人一贯的特征。孔子和他的门人虽然也说过行藏取舍的话，如“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之类，但孔子的“藏”，不等于消极的“隐”，而是等待时机，志在守“道”。这里说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其所作所为，也绝非隐者的行径。对于隐者、对于避世者，孔子及其门人是自有看法的。这在《论语》一书中也有专章描述。例如《微子》篇写长沮桀溺耦而耕一章：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桀溺是何许人？前人的说法很不一致。《史记·孔子世家》叙此事于孔子去叶反蔡之时，好象长沮桀溺实有其人，而子路问津也实有其事。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说：“长沮桀溺名皆从水，子路问津，一时何自识其姓名？谅以其物色名

之，如荷蓑、晨门、荷蓑丈人之类。”后来俞樾也有类似的看法。这虽然否定了长沮桀溺是真名真姓，可是仍然肯定确有其事其人。

依我看，这段文章恐是虚构。不仅长沮桀溺并非真名真姓，就连其人其事也未必实有。《论语》的编者为了表达儒家主张积极用世、反对消极避世的思想，于是便“取象”于长沮桀溺，假借他们的言论，发表自己的主张。一问一答之间，对于避世的思想进行了巧妙的驳斥。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云云，我看也不是随便一说，而是有所针对，很可能是针对庄周一派讲的。庄周一派是主张“同与禽兽居”（《马蹄》）的，而孔子不然，他是不肯离开“斯人之徒”而避世的。“斯人之徒”指哪些人呢？我看曾晰所说的那“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大概也就都在其内。

司马迁给庄子立传时，曾说《庄子》一书“大抵率寓言也”，其中“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这话说得不错。但可惜，司马迁对于《论语》的个别篇章却没有提出类似的看法。其实，长沮桀溺何尝不是畏累虚，亢桑子一类？这些人物，可能都是“子虚”、“乌有”，都是行文之际、“深于取象”而虚构出来的。

在先秦诸子中，最“深于比兴”、“深于取象”的文章，还得首推《庄子》。《庄子》一书包括内篇外篇和杂篇。有人说内篇是庄周自著，外杂各篇出于后学之手。其实古人著书，师徒相继，本来不必出自一人，成于一手，才算一家的著作。今天看来，尽管全书思想比较驳杂，文风也不尽统一，但有一点